



程 诚

山水田园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种类。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们亦钟爱创作山水诗，他们热情讴歌祖国的大好山河，寄寓自己的革命志向与乐观情怀。朱德的山水诗就是其中的典范。

匠心描绘祖国美景

朱德热爱自然，常以质朴、清新的笔触去刻画祖国的山水美景，对古代山水田园诗多有承继。

他于1918年率部在四川泸州剿匪时，曾创作《军次云谷寺晓行书所见》（二首），如其一云：“翠叠层峦曙色融，如珠晓露滴梧桐。浮屠矗峙浮云外，古刹深藏古树丛。风漾田波翻碧绿，日烘榴火闪新红。天然一幅佳图画，费尽苍天点缀工。”这首诗描写的是泸州云谷寺附近的山林田地之晨景，有曙光映照下的叠翠山峦、梧桐树上滴落的露珠、被风吹动的田地绿苗以及树上火红的石榴。全诗声色兼备、动静结合、诗中有画，颇有王维之风，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陶醉在美景中的怡然自乐之情。

此类代表还有《上东山》《登西湖南高峰》两首诗，生动刻画了他于1960年间陆续登上贵阳东山和杭州南高峰时所见美景。《上东山》云：“登峰直上画楼台，春色满城眼底开。四面青山围海，花溪绿水向东来。”此诗描写形象，别具匠心，“直上”一词展现了东山的陡峭，“画楼台”喻山色美如画，“青山围屋海”以动写静、惟妙惟肖，“绿水向东来”显得颇有气势。《登西湖南高峰》云：“登上南高峰，钱塘在眼中。回首西湖望，江山锦绣同。”这首五言绝句有着身临其境的空间感，远近高低各种角度展现作者所见的锦绣山水，末句情感进行了升华，扩大为歌颂祖国大好江山，凝练的语句中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之情。

集中抒发革命情怀

朱德的山水诗在描绘山水美景时，有着明显不同于古代山水田园诗的特点，更注重借景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

他在护国战争时期的革命志向，可通过1916年创作的《五峰岭题诗》来感受。《五峰岭题诗》云：“泸阳境内数名峰，绝顶登临四望空。立马五峰天地小，群山俯首拜英雄。”此诗风格雄放、豪情万丈，妙笔突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护国英雄们的伟岸形象，登顶的那一刻，仿佛“群山”都在向这些革命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此同时，“绝顶登临四望空”一句又抒发了将士们的博大胸怀，表现出无惧一切敌对势力的坚定、乐观的革命志向。

第一次护法运动后，他的革命情怀以其写下的《苦热》（五首）为代表来集中抒发。如其一云：“雨后朝朝上晓峰，登高缓步气从容。三官寺外炊烟袅，百子图中曙色浓。滚滚长江嗟远逝，茫茫大野喜云封。伏中炎热人何苦，心冷如何苦到依。”这首诗借描写泸州忠山附近的美景反衬出诗人心中的“炎热”“苦”及“心冷”，深刻表达了他对于军阀混战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关怀之情。

抗日战争时期，在率领八路军与日寇转战太行山时，他于1939年春天写下了著名的《太行春感》，诗云：“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此诗借景抒情，本该是百花争艳的春天，太行山却是“镇日阴”，喻当时的革命形势严峻，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国统区阴暗的政治形势。但“太行高耸气森森”，喻革命将士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势。颌联、颈联则歌颂了将士们坚持革命的雄心壮志与不朽战绩。尾联表达了把日寇赶走的坚定信念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名篇《游七星岩》集中反映了革命家的高尚品德。这首诗作于1959年朱德巡视广东时，在游览了当地名胜七星岩之后，他有感而发，诗云：“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此诗巧妙运用双关。首联以神话传说描写七星岩，美得仿佛不真实。颌联“发冲冠”，既比喻七星岩上草木葱茏，又暗喻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事业而“怒发冲冠”。颈联的“开心”“见胆”“破腹”，既比喻岩洞内的景致，又暗喻革命家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尾联既比喻洞内可游船赏玩，又暗喻革命家度量宽大，“宰相肚里能撑船”。

《游闽江》《游鼓山》则集中表达了在国民党意欲反攻大陆的时代背景下，革命家对于国防安全的关心。这两首诗皆作于1961年他巡视福建时，《游闽江》云：“四面青山绕福州，闽江三歧终合流。老小同舟欢共济，谆谆细语话家仇。”“终合流”“同舟欢共济”“话家仇”体现了军民携手共同对敌的壮志。《游鼓山》云：“鼓山高耸闽江头，面貌威严障福州。纵有台风声猖獗，从来不敢到闽侯。”此诗以豪迈之风表面描写鼓山的高峻与威严，实则喻国防部队的凛然气概，“台风”则喻国民党虽“声猖獗”，但其反攻大陆的计划是不会得逞的。

朱德的山水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诗中反映了新中国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强烈寄托了他的美好希冀。这些诗歌语言朴素、风格豪迈，饱含着革命家的壮志雄心，不仅能够带领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且坚信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

《过五指山》《上白云山》分别展现了当时海南、广东的建设成就。1957年1月朱德视察海南时，游览了有“海南屋脊”之称的五指山，乘兴写下了《过五指山》，云：“深山建公路，崎岖使之平。幽谷多俊秀，草木尽峥嵘。奇峰名五指，溪涧泉水清。花鸟鸣得意，那知秋与春。车过村落地，老少夹路迎。语言虽不通，笑貌传感情。夜宿自治州，同志畅谈心。民族欣解放，迁移出山林。”这首诗如同诗史一般，依次描写了深山基建所取得的成就、山色美景以及自治州人民对党的热情拥护，表现了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建设逐步推进，人民生活日益幸福。2月，他又登上广州白云山，作《上白云山》云：“白云山上白云深，雨后春光一色新。珠江两岸琼楼现，净扫门庭迎国宾。”此诗第一句交代了白云山得名的原因，第二句“一色新”既描写雨后山色一切都很清新，又暗喻后两句内容中国国家建设之“新”。第三句描写珠江两岸增添了很多漂亮的新建筑，展现了当时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最后一句又寄托了诗人希望这里进行对外开放的意愿。

《登西湖北高峰》不仅展现了当时浙江的建设成就，还强烈寄托了他对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美好希冀。1961年，他视察浙江时登上杭州西湖的北高峰，作《登西湖北高峰》云：“登上北高峰，海拔三百三。缓行一时半，二次到顶峰。西面看天堂，北望有莫干。南对南高峰，东看大平原。西湖在眼底，灵隐在膝前。吴山与玉顶，四面山相连。钱塘到龙井，公路一小圈。十年植花木，盛装此湖山。十年修公路，大圈套小圈。十年勤培养，天堂逊人间。”这首诗前四句叙述了北高峰的高度及登山历程。中间八句描写了登山后四周眺望所见景致。最后八句描写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年的建设，此地已是花木葱茏、交通便利，一切美不胜收。虽然古有谚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在朱德看来，如今建设形势一片大好的杭州乃至全国，即使是真正的天堂恐怕也要略逊一筹了。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孙羽津

《红灯记》：革命自有后来人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现代京剧《红灯记》中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唱腔，伴随着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三代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已在华夏大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而今，只要剧场里上演这部红色经典，总会有观众情不自禁地与演员一同哼唱起来，这不但是观演的互动，更是情感的表达、岁月的怀想、心灵的共鸣。我们不禁追问，一部革命题材的戏曲作品，何以跨越世纪的旅程，如此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我们不妨从该剧长达8年的创作历程谈起。

从《自有后来人》到《红灯记》

作为一部红色经典，《红灯记》经历了漫长的创作改编历程。早在1962年，剧作家沈默君、罗国士根据东北地区地下工作者的革命事迹创作了剧本《自有后来人》。而后，哈尔滨市京剧团、上海爱华沪剧团分别据以改编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1964年，中国京剧院将沪剧《红灯记》移植改编为京剧《红灯记》。该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生动塑造了共产党员、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三代艺术形象。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保护、传递党的一份密电码，与凶暴奸险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李玉和与他的母亲李奶奶不幸被捕牺牲，保护密电码的重担落在了李玉和的女儿——年仅17岁的李铁梅身上。铁梅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承奶奶和父亲的遗志，成功将密电码送到柏山游击队，最终完成了党的任务，成长为一名革命接班人。

1964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给予高度评价。据当事人回忆，当晚毛泽东深受感动，特别是看到“痛说革命家史”和“刑场斗争”两场戏时，眼角里渗出了泪水。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起《红灯记》，他感慨道：我原想一家三口都不要死，看了大悲，可那个时候的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的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

与此同时，《红灯记》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巡回演出，反响热烈，被誉为“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1965年，中国京剧院在深圳演出《红灯记》时，吸引了许多香港同胞跨过罗湖桥争相观赏。当年，香港戏剧界就排演了同名话剧，后又拍摄了粤语电影《红灯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虽然《红灯记》获得了广泛赞誉，但主创团队并没有停止创作加工的脚步，甚至包括较大幅度的改动。直至1970年，《红灯记》最终定稿，



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红灯记》拍成电影，高玉倩塑造的李奶奶、钱浩梁塑造的李玉和、刘长瑜塑造的李铁梅形象鲜活生动、深入人心、风靡全国。

“我家红灯有人传”

从《自有后来人》到《红灯记》，最根本的创新就是充分发挥戏曲艺术写意抒情的审美特质，凸显“红灯”的复合属性：红灯不仅作为工具性存在，而且作为革命抒情意象贯穿全剧始终。

剧中的红灯，又名号志灯，本是李玉和在铁路工作中使用的信号灯。同时，红灯还承担着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李玉和一家从事地下工作使用的暗号灯。比如，当与地下交通员、与游击队队长（假扮成磨刀人）接头时，高举红灯意味着发出联络暗号、确认革命身份。这就是红灯在李玉和一家日常生活中的双重功用。

如果说，红灯的工具性与该剧的传奇性紧密相连，那么，在这部革命传奇的背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李玉和一家三代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如何更为直观地、形象地、深入地传递到观众心中、植根于观众心中呢？这就离不开对红灯的革命抒情意象的渲染和升华。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李奶奶在向铁梅讲述革命家史之前，先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一段“红灯史”：“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哇……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哇！”“红灯史”不仅是革命家史的抒情象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抒情象征。于是，“红灯史”成为李奶奶对铁梅的革命启蒙，激发了铁梅对革命、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听罢奶奶说红灯，言语不多道理深”，“我想到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在铺垫了“红灯史”的抒情启蒙后不久，李奶奶进入了革命家史的叙事启蒙，将一家三代的悲欢离合上溯至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之中，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丰功伟绩。其间，“红灯”意象在李奶奶、铁梅的讲述型念白和言志型唱腔中交替出现，最后凝结为二人高举红灯亮相的舞台造型。就这样，借助唱念做舞的综合表现，“红灯高举闪闪亮”的革命抒情意象得以强化，祖孙三代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得以凸显。

“红灯”作为革命抒情意象，还象征着理想信念的传承。在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当李奶奶讲到罢工遭到镇压、李玉和负伤回家时有这样一个细节：“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按：指李铁梅）”。实际上，这预示着铁梅的人生轨迹，传递着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戏剧主题。与此相呼应的是，十七年后的当下，李玉和被捕入狱，而他曾经左膀右臂所肩负的希望，如今已融为一体——“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我这里举红灯光芒四射”，聆听完革命家史的铁梅，紧握红灯，运用戏曲最经典的“圆场”程式，展现着历经十七年狂风骤雨、直面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新青年的勇毅与担当。至第八场“刑场斗争”，当李玉和与铁梅生离死别之际，“红灯”意象再次凸显，李玉和临终前最后一段唱腔起首即云：“万里长江波浪翻！我家红灯有人传。”李玉和生前最欣慰的事情，就是亲眼见证了铁梅从一个“提篮小卖”的“好闺女”，成长为一名“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立志“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革命者，见证了“红灯”所象征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李玉和一家三代

传承的不仅是一种革命理想，而且还饱含着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革命理想与家国情怀的水乳交融，乃是此剧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所在。

家，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大凡世间伦理、道德、情感，端赖“家”的孕育、滋养，才得以巩固和光大。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方面是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上演，另一面是严酷惨淡的现实生活依然需要勇敢面对，任重道远的革命事业依然需要不断延续。在这种状况下，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革命家庭诞生了，这不仅反映了革命斗争的严酷性，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家”的眷恋与执着。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组成的家庭，就是由烈士遗孀、工运幸存者 and 烈士遗孤组成的。李奶奶的丈夫是工运烈士，他曾与两个徒弟陈志兴、张玉和一道参加工运，陈志兴亦不幸牺牲，遗有一女即铁梅，被师弟张玉和救起。自此，张玉和改姓为李，三代幸存者组成了新的家庭，担起了先烈们未竟的事业。

综观全剧叙事脉络，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家庭秘辛，直到第五场李玉和被日本宪兵队带走、地下工作陷入危机之际，才由李奶奶向铁梅和盘托出。然而，在李奶奶说破真相之前，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情形，甚至不乏调侃、撒娇等一系列生活细节，让观众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他们并非血亲。而这种“家”的情感和认同，即便在铁梅惊诧地得知自己身世之后，也没有丝毫淡化，反而比以往更为炽热浓烈。特别是到第八场李玉和临刑之前，他不知李奶奶已向铁梅讲述家史，欲告知铁梅身世，不料铁梅竟抢先说道：“爹！您别说了，您就是我的亲爹！”紧接着，铁梅深情凝望父亲、双膝跪地，父女间十七年的至爱深情毕见于此。面对此情此景，李玉和感慨道：“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

李玉和的这句话，凸显出工人阶级的革命情义。因为李玉和一家三代，不仅有对“家”的眷恋和执着，更有对“新中国如朝阳光照人间”的憧憬和向往。其间，阶级情义不仅让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得以延续，也推动着抗战救国的革命事业薪火相传。家国情怀则为革命者的阶级情义提供了坚韧而不失温润的心灵寄托和文化土壤。从这个层面上讲，《红灯记》不只是一部生动反映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的戏曲精品，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经典。

“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红灯记》也是咱们的传家宝。

